



中國新語

〔生活與文化分冊〕

邱仲麟主編

中國史新論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叢書

中國史新論 生活與文化分冊

2013年7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6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主編	邱	仲	麟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	編輯	方清河
地址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對	馮蕊芳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封面設計	翁國鈞
叢書主編電話	(02)87876242 轉200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號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23620308		
印刷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2917802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86-03-7165-9(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kingbooks.com.tw

電子郵件：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史新論 生活與文化分冊/邱仲麟主編。

初版。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聯經。2013年7月（民

102年）。464面。17×23公分（中央研究院叢書）

ISBN 978-986-03-7165-9（精裝）

1.文化史 2.生活史 3.中國史 4.文集

630.7

102011425

總策劃◎王汎森

各分冊主編

古代文明的形成	黃銘崇
基層社會	黃寬重
生活與文化	邱仲麟
思想史	陳弱水
美術考古	顏娟英
法律史	柳立言
醫療史	李建民
宗教史	林富士
性別史	李貞德
科技與中國社會	祝平一

慶祝
中研院史語所
成立八十周年

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

邱仲麟◎主編

《中國史新論》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傳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
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2008年10月22日

史語所八十周年所慶日

目次

《中國史新論》總序	王汎森	i
導言	邱仲麟	1

許倬雲

中國古代平民生活——食物、居住、衣著、歲時行事及生命儀禮	25
一、前言	25
二、農耕	26
三、飲食	32
四、居住	36
五、衣著	43
六、歲時與生命行事	48

王利華

漢唐飲食與生態環境	53
一、飲食體系之地域分野及其自然基礎	54
二、食料結構之調整及其生態背景	66
三、造食技術和飲食結構與環境的關聯	87
四、簡短的結語	113

葛兆光

由俗而聖——中古道教科儀的宗教化	117
引言：從胡適和楊聯陞的通信說起	117
一、早期道教的流風餘韻？塗炭齋、過度儀與廟會	119
二、寇謙之與陸修靜：5世紀南北道教科儀的聖潔化	132
三、中古道教科儀的確立：理論、制度與方法	150
尾聲：中古道教科儀的最終總結	161

甘懷真

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	165
一、京城社會作為一個中國史的課題	165
二、漢代選舉制與京城社會的成立	170
三、漢末的黨人與京城社會的成熟	175
四、魏晉時期的九品官人法與京城社會	180
五、唐代的京城社會	187
六、京城的文化意象與權力	192
七、結語	197

陳愛怡

元代書院與士人文化	199
前言	199
一、蒙元前期北方與南方的書院	203
二、書院制度的形成與元代的士人政策	214
三、由士人學術社群到鄉里教育組織	242
四、書院在北方的傳布	255
結論	262

王鴻泰

明清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	267
前言	267
一、明清士人的歷史圖像	270
二、城市生活與社交活動	283
三、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	295
結語	313

費絲言

明清的城市空間與城市化研究	317
一、城市作為一新興社會空間	318
二、城市化與城市空間	327
結論：由以「中國」為中心到「朝代」為中心的城市研究	341

巫仁恕

明清的廣告文化與城市消費風尚	343
導言	343
一、商標、品牌與字號	345
二、招幌與楹聯	351
三、社交與廣告	358
四、節慶賽會的展示	364
五、廣告與城市	365
六、流行時尚的宣傳與創新	368
七、士大夫的品味與身分的塑造	371
結論	374

邱仲麟

晚明以來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	377
一、序論：奇器製造家	377
二、千里鏡與目光的延伸	381
三、西洋鏡與藝術活動	397
四、小小洞天西洋景	405
五、攝影術與西洋寫真	413
六、從幻燈影戲到電光影戲	432
七、結語：新視覺時代的來臨	444
英文目次	449

導言

——從文化史、社會風俗到生活

一

在中國，「文化」一詞，最早可溯源自《易經》賁卦所說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人文」教化的意涵，到了近代開始出現轉變。19世紀末以後，西方意義的「文化」(culture)，大量出現在文史學界的論著中，而其背景與中西文化交流愈益緊密離不開關係。

20世紀初，透過一批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的學生的譯述，許多文化史著作被陸續介紹進中國，其中日本的中國文化史論著，如中西牛郎(1859-1930)的《支那文明史論》、田口卯吉(1855-1905)的《中國文明小史》、白河次郎(1875-1915)的《支那文明史》等，其譯本均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或之前出版。而從20世紀初到中葉的50年間，中國史學界有關中國文化史的幾十部著作，大部分的歷史觀深受歐美、特別是日本文化史家的社會達爾文進化論、地理環境決定論、種族決定論、心理因素決定論等觀點的影響¹。

關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梁啟超(1873-1929)無疑是一個開拓者。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在《新史學》就指出：「中國數千年，唯有政治史，

¹ 鄭振環，〈中國文化史研究五十年著作一瞥〉，《讀書》1985.4：39。

而其他一無所聞。」為此，他將史學重新定義：「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民國十年秋，他應聘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印有講義《中國文化史稿》，雖然內容「只能被看作歷史編纂學史的引言」，但卻是「中國高等學校關於這門學科的首出課程和首出教材」。或許他自己也感到名實不副，所以在正式出版時，改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不過，對於文化的進化論，他後來有所修正。民國十一年十二月，梁啟超接受南京金陵大學的邀請，演講〈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對文化史研究的歸納法、因果分析法和進化觀提出質疑，而開始傾向循環論。稍後，梁啟超又計畫撰寫多卷本的中國文化史，這一構想部分呈現在民國十四年於清華大學開課的講稿《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中²。

20世紀初以來，最早以「文化史」為題的著作，歷來均認為是民國三年林傳甲在上海科學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史》。晚近有學者考證，此一說法純屬誤傳。林傳甲(1877-1922)的著作中，只有《中國文學史》而無《中國文化史》，而且《中國文學史》出版於光緒三十年(1904)。因此，若捨去梁啟超的《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不論，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專著，應屬顧康伯的《中國文化史》³。顧康伯的《中國文化史》，係因在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任教之需所編，起稿於民國十年夏，完成於十二年秋，民國十四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他在〈自序〉中提到：「歷史云者，所以考究過去時代人類生活之狀況，而明其進化之階級，俾學者於國家、於民族、於社會，知有所以改進也。換言之，歷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⁴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其受到進化論影響的痕跡。

² 朱維錚，〈中國文化史的過去和現在〉，《復旦學報》1984.5：61。周積明，〈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歷史研究》1997.6：122。鄭先興，〈新史學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論與梁啟超的文化史研究〉，《南都學壇》27.1(2007)：27-28。

³ 鄭先興，〈中國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史學月刊》2005.12：114-115。

⁴ 顧康伯，《中國文化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自序〉，頁1-2。

但若就編寫先後而論，柳詒徵(1880-1956)的《中國文化史》無疑在顧康伯之前。柳書的初稿，作於民國八年至十年間，原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授課的講義，隨編隨印，發給學生，「其後雖微有修改，亦迄民國十五年為止」。該書內容，民國十四年至十七年，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後來並出版合訂本。民國十七年，中央大學又出版排印本。民國二十一年，在南京鍾山書局正式印行。民國三十六年，上海正中書局將其收入大學用書，重新刊印。柳詒徵在書中嘗言：

世恒病吾國史書，為皇帝家譜，不能表示民族社會變遷進步之狀況。實者民族社會之史料，觸處皆是，徒以浩穰無紀，讀者不能博觀而約取，遂疑吾國所謂史者，不過如坊肆《綱鑑》之類，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舉凡數學、文藝、社會、風俗，以至經濟、生活、物產、建築、圖書、雕刻之類，舉無可稽。吾書欲祛此惑，故於帝王朝代國家戰伐多從刪略，唯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廣搜而列舉之。(見頁9)

正如學者所指陳，柳詒徵反對毫無止境的疑古，而認為必須廣蒐史料加以分析，表現出明顯的信古傾向，而從書中內容也可以看出強烈的民族主義。他還認為：「歷史現象，變化繁賾，有退化者，有進步者，有蟬鳴不絕者，有中斷或突興者，固不可以一概而論也。」這是一種進化與倒退並存的文化史觀。該書自問世以後，流傳與影響頗大，胡適(1891-1962)雖指摘此書有許多疵漏，但也認為「柳先生的書，可算是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而梁漱溟(1893-1988)也是在讀了柳著《中國文化史》後，「深受啟迪，從而有《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出版」⁵。

⁵ 張文建，〈柳詒徵和《中國文化史》〉，《學術月刊》1985.5：68-72。孫永如，〈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頁107-124。吳忠良，〈柳詒徵和《中國文化史》〉，《東方論壇》2010.6：111-115。

當時，在學校講授中國文化史者甚多，有些講義並未出版，呂思勉（1884-1957）就是其中之一。民國十八年，他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講授中國文化史，現存《中國文化史六講》就是上課的底稿。他在〈序〉裡指出：「文化者，人類理性之成績也。」⁶特別標榜「理性」的文化，這點頗值得注意。該課程原定分為二十講，現存講稿僅前面六講。

另外，陳國強的《物觀中國文化史》，民國二十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作者在〈導言〉中強調：文化「是人類依其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而創造、而展開之精神生產的成果之總和」；故書中「在敍述各時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注意說明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生產技術的發展階段，使讀者明瞭這兩者間的適應關係。」同年，楊東蓀主編的《本國文化史大綱》，由北新書局出版，他在〈序言〉提到全書的宗旨乃是「用經濟的解釋，以闡明一事實之前因後果與利病得失，以及諸事實間之前後相因的關聯。」⁷

陳登原（1900-1975）所撰的《中國文化史》，則在民國二十四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他撰寫此書的動機，是覺得「某氏之書于心未愜」，所指乃是他就讀東南大學期間（1922-1926）的歷史老師柳詒徵所寫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在其書中明確提出現代意義的文化史理論，〈卷首·敘意〉分別以「中國文化史之意義」、「中國文化史資料論」、「治中國文化史者的態度」、「何為治中國文化史」為題，探討文化史的核心概念、對資料的處理方法、文化史研究的預設理論，以及寫作文化史的目的等問題。陳登原提出其治中國文化史的見解有三，即：「因果的見解」、「進步的見解」、「影響的見解」，這是他文化史理論的基石，涉及文化發生、發展、本質等根本問題。這些見解並非他所獨創，其理論原型是民國一、二十年代進入中國學術界的巴斯典（Adolph Bastian, 1826-1905）、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以及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⁶ 呂思勉，〈《中國文化史六講》序〉，收入《呂思勉遺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下冊，頁95。

⁷ 鄭振環，〈中國文化史研究五十年著作一瞥〉，頁39。